



新时代青年发展政策的重大创新

■ 张良驯

新时代10年，党中央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推动青年发展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青年发展政策有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重大创新成果，使得青年发展工作纳入国家治理范畴，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青年发展政策的根基更加牢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五四青年节期间，都出席青年活动，同青年代表座谈，给青年写信，提出了一系列方向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青年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和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职责使命、路径方法等重大课题。

10年来，党中央就加强和改进青年工作，推出了一系列开创性政策举措，推动青年发展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中共中央2015年1月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更加重视群团工作，深入研究群团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对发挥群团组织作用给予有力指导和支持。2015年7月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领导群团组织是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政治制度，要求各

级党委把党的群团工作同党委其他工作部署同检查总结。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6月下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共青团改革做出了全面的具体的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4月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更好发展做出了整体规划。2022年4月国新办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为青年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共青团具体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一整段话阐述青年和青年工作，强调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这有利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发展政策建设，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纵深实施，维护青年发展的普遍性诉求，促进青年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青年发展政策的体系更加完善

新时代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涉及青年的法律为基础，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主干，以针对青年的政策为支持，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为新时代青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0年来，支持青年发展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教育法》《就业促进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个与青年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得到修正，适应了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需求。

10年来，青年发展政策的最大亮点是制定和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有青年发展规划，部分地市和县区也颁

布了本区域的青年发展规划，青年发展的一些要求纳入了国家和地方的三十五十四五规划内。

我国早在1992年就制定了《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但一直没有制定青年法，《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根本性地改变了这种多年存在的缺乏综合性、跨部门的青年发展专项政策的状况。之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只适用于14—18岁的青年，而且它们都不是青年的总体发展公共政策。《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跨部门的青年发展政策。第一，其政策效力较高，尽管不是法律，但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属于我国最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第二，跨部门，涉及许多中央国家机关，不是共青团中央的部门规划。第三，综合性，提出了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年社会保障10个青年发展领域及其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

10年来，相关党政部门制定了大量支持青年发展的相关政策，其中很多是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例如，2017

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6月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2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等。这一系列具体举措为青年发展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青年发展政策的实施机制更加有效

新时代以来，国家创造性地做出了建立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的制度化安排，在国家层面已建立由5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参加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各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了这样的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由本区域内党政领导担任召集人，相关部门参加。

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把青年发展工作纳入党政工作范畴。联席会议组成部门及其组成人员，都得经过同级党委批准同意。

在省、市、县三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普遍是同级党委分管共青团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为同级团委第一负责人。青年发展工作不是单纯的共青团工作，而是一项党的青年工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共青团具体协调。这样，青年发展工作就进入了党政工作领域，成为党的青年工作、政府的青年工作。

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建构了青年发展事务的合作共治模式。这是一种在党委领导下，相关党政部门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中进行跨部门、跨层级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复杂而棘手的青年发展问题，增进青年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提出的青年发展领域与党政部门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多种部门边界的交叉地带，只有通过青年工作联席会议进行协同治理，发挥共同参与的部门各自的职能优势，才能推动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把力量汇聚到实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上来，使得各种实施要素成为一个作用互补、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青年工作联席会议赋予了共青团协调青年发展事务的重要职能。在我国，青年工作属于党的群团工作范畴，各种青年发展事务过去往往分散在众多党政部门之中。共青团是党的群团组织，一个时期以来与政府部门缺乏横向联系，对诸多青年发展事务难以参与，更少制度化规定的和制度化的渠道。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则赋予了共青团协调党政部门参与青年发展事务的新职能。

（作者系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

■ 庄贵阳 王思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

全球生态危机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工业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推动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普及，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飞跃式提升。人类物质需求得到极大丰富满足。然而，在以资本无限增殖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相互交织影响，导致人与自然间冲突不断加剧，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三大环境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已向人类发出红色警告，全球气温将会在2030年上升超过1.5℃。全球升温一旦突破1.5℃阈值，会触发多个气候风险临界点。《柳叶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相当于全球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上估计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守牢生态环境底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让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00万种动植物，其中有100万种濒临灭绝。在过去50年里，野生脊椎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68%，许多野生昆虫物种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认知框架下，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价值易被忽视。自然被看作取之不竭的宝库，被无休止地攫取，人类美好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甚至达到了不可修复的程度，间接或直接地制约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生态危机并非无法扭转的灾难，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在认知与实践上异化的表现，人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也能够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掌握一定主动权。未来，必须在认识与实践层面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为自觉行动，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20世纪中叶以来，原本在工业化发达国家局部偶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全球蔓延开来，造成地球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显著下降，引发社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等经典著作的出版，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实现了重要飞跃。

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从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12年的里约+20峰会，再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签署《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为解

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持续进行着不懈努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与自然和平相处》报告指出，人类应当改变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与自然和平相处，以确保可持续的未来。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生态系统被无限切割为工业化大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人类对自然界的攫取和破坏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生态系统整体性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矛盾激化，新陈代谢断裂显现并加剧，致使生态危机不断深化。生态危机表象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解决，要着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根源性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寻求有效解决方案。

发展范式转型的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引领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在理论创新方面，生态文明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唯资本发展理念。中国现代化重要特征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缓解了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与自然矛盾关系认知的困扰，揭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能够相互促进的关

系，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修复生态创伤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制度创新方面，生态文明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中心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章、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并通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促进环保主体责任下沉，为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在实践创新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直接驱动因素上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的方法论。创新性地进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方略，并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着力于缩小新陈代谢断裂，从根源上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相互冲突的困境。

中国具备推动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向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的制度优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指明目标愿景，同时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应对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促进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的实践指向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开启的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指向和科学指引。既要修复已经存在的新陈代谢断裂，也要减缓

当博物馆与舞蹈相遇：用舞蹈活化文物

■ 王柯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艺术瑰宝，既保留在文献中，也保留在文物中。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兴起和繁荣，为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亟须以数字化为宣传思想工作赋能的新媒介时代，系统探讨博物馆与舞蹈跨界合作、密切互动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魅力有着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回信，勉励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舞蹈走进博物馆和文物的舞蹈活化进程，正是笔者执教的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乃至全国的博物馆专家、舞蹈家及舞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

从走进到走出：博物馆中的舞蹈到舞蹈博物馆

乐舞文化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器皿上的舞蹈纹饰、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乐舞场面描绘，再到乐舞俑、造像艺术等，一件件安静伫立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以活灵活现的动态与动感，让人不禁想象当时载歌载舞的历史情境，文博研究者需要破译并理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原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文化意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在内的全国重要文博机构和专家，对于地域性、区域性的乐舞文物均有深厚研究，近年来更是策划了一批专题性展览。比如，2017年陕西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了《唯奇歌舞

官呈现；专业艺术院校的师生也在通过研究和教学，让静态文物以舞蹈创作的方式复现、活化和再创造，走出博物馆，释放新能量。

《只此青绿》的一大创新，在于致敬了古代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工匠精神，不仅仅让作者王希孟的天才被看到，也让籍籍无名、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的身影被铭记。

从舞者到舞蹈空间：敦煌舞的前世今生

近年来涌现出的《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唐宫夜宴》《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等知名舞剧及舞蹈作品，都同文博研究有着深厚缘分。

其中，反弹琵琶伎乐天、千手观音等舞蹈都来自对敦煌文化艺术宝库的深度发掘与研究。1979年甘肃省歌舞团创排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正是在时代号召下，由大批学者、艺术家组成的团队，经由对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跨文化文明结晶的敦煌学的潜心研究而来，也开启

了特色鲜明的敦煌舞的发展之路。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史敏是《丝路花雨》中英娘的第三代扮演者，她从学习、演出、研究到教授敦煌舞蹈的四十多年经历，生动诠释了一代代敦煌舞者如何让壁画活起来和传下去。从对着一张一张静态画稿挖掘静态造型、推敲动作律动线形成连续性动作、加工提炼成综合舞台艺术，再到形成相应的教学训练体系和课程体系，这其中始终有着跨学科专家在场参与。正如敦煌研究院王志鹏研究员所强调的，敦煌舞蹈复现中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即正确处理想象与真实、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辩证前提下思考当代舞蹈的传承与创新。史敏教授对于敦煌舞的研究与教学，也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当代方法与眼光，让一代人有属于一代人的反弹琵琶。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宁强教授的研究则进一步提示我们，当下的文物活化如敦煌舞不但是关注静态图像的动态连接、对于动作的复现和活化，也要对其舞台和表演空间、整体文化场域和乐舞精神等形成系统性思考，对谁是表演者、谁是观看者、为何表演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可能是实现

敦煌舞蹈活化的另一条重要路径。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空间体现了统一安排天宫伎乐、观看者与表演者融合以及镜像空间的特点，与当下流行的沉浸式演出形式有某种共性，呈现出演出空间的高度开放性和无边性。2022年宁强教授在北京南池子美术馆策划演出的《飞沙》主题敦煌乐舞，正是利用庭院中的水面对这一舞台空间进行舞蹈活化的创新实践。

从物到人：文舞相融中的生命传递

最近这几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纪录片和综艺节目的热播，文物与文博话题以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姿态引发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热切关注，也让文物国宝背后的人逐渐浮出水面，由幕后走到台前。

1979年版《丝路花雨》的主角之一神笔张，就是以唐代莫高窟普通画工为原型。2022年现象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一大创新，也在于从以往被作为绝对主体展现的《千里江山图》画作本身，转向了宋代美术生产工艺的物

甚至遏制新陈代谢断裂的扩大速度，应继续着力于绿色发展方式转型、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能源动力系统迭代等工作，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首先，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范式绿色转型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全面实施节约战略，着力推动产业、能源等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及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和协同治理，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腾出容量。以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更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第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守牢生态环境底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让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短期与长期、整体与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全国一盘棋部署下，积极稳妥分批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出发，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推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引领全球碳中和进程。

（庄贵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思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